

兩期文革專號刊登後，迴響熱烈。今期「三邊互動」摘編數則回應，冀能喚起更多討論，以推進相關研究。暑假過後，平靜的校園復歸熱鬧，本刊祝願諸君新學年碩果累累。

——編者

#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 毛澤東發動文革有一個一以貫之的「計劃」嗎？

秦暉的〈「手段」比「目的」更重要——從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思想史研究」談起〉（《二十一世紀》2016年8月號）一文，以毛澤東在文革期間對造反派的打擊為例，對毛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進行了評判。

秦文試圖說明：不管為了甚麼目的，都不能不擇手段；反之，只要堅持底線，不以犧牲他人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其實不管持甚麼理想，問題都不大。共產主義理想本身不是問題，而以「不惜千萬人頭落地」的方式去實現這一理想才是問題。在作者的論證中，常常把不同時期發生的事穿插在一起，來討論毛的行為動機，這其實預設了毛發動文革有一個一以貫之的計劃，他從一開始就設計好了之後一步步的行動，這樣我們就能從他之後的所作所為中反推他之前的想法。對這一假設，筆者持懷疑態度。

筆者曾研究過1950年代毛發動的一些運動，研究方法是對照毛和其他領導人的年譜，去一點一點還原毛每天的所思所為，然後將它們與運動的進

展進行比照。當把這些串起來之後，一個強烈感覺是毛是人不是神，多數事情他都不能未卜先知。筆者傾向於認為，毛在發動文革時可能只有一個粗線條的計劃，文革發動後他的想法是不斷變化的，很多事情的發展其實出乎他意料之外。當然並不是說毛發動文革沒有一個完整計劃，但至少不應把這當做一個不證自明的假設。我們必須回到歷史情境中一點一點重構歷史。此外，文章第15頁的「最典型的是1969年的『二月鎮反』」一句，似應改為「1967年的『二月鎮反』」。

寒葱 北京  
2016.8.24

## 打掃文革「記憶戰場」有感

魏林格、崔金珂的〈文化大革命的記憶戰場——共識與和解〉（《二十一世紀》2016年8月號）一文是對不同的文革記憶問題的深切評述。當今中國，對於文革，人們有無共識與和解的可能和必要？筆者認為迄今為止，可能幾乎為零，必要微乎其微。文革記憶大致可歸為三類：一是從文革之前的生活而來的記憶，二是從文

革之際的演變而來的記憶，三是從文革之後的現狀而來的記憶。而最廣泛、最常見、最主要的就是第三種記憶。

一方面，當今中國對於文革更多地限於記憶及其解說，還遠遠沒有達到總體的精神反思和整體的實踐變革。另一方面，人們對於文革無法取得共識與和解，在一定程度上與當今中國意識形態的分化和裂變有關，中國已不可能再有文革時期那樣的一統天下、鉗制萬民的意識形態局面。這種分化和裂變既是當今中國精神危機的一大體現，也是官方與民間、「正統」與「異端」之間的思想持續分裂和不斷衍生的真切反映，更是人們在文革記憶問題上千差萬別的深刻折射。

文革記憶所出現的局限、殘缺、失誤、疏漏、短見或偏頗等等，與其說是合乎必然的、完全可以理解的，不如說是進一步促使人們去開掘和深化文革研究的某種「礦源」。從林林總總、形形色色的文革記憶中，不難發現文革之前中國歷史進化的軌迹，文革之際中國革命異化的脈絡，文革之後中國改革演變的取向。

唐少杰 北京  
2016.8.18

## 「人民文革」或「小文革」?

陳意新在〈文革初期農村的造反運動——安徽老翟村和定遠縣的案例〉(《二十一世紀》2016年8月號)一文中，聚焦於農村文革這一至今仍然「缺席」的領域，有助於學界逐步修正文革是一種「城市的現象」的定見。作者闡明文革在老翟村這一特定環境中的表現，實際上是受到冤枉的基層幹部，希望藉「造反」向匆忙撤退的四清工作隊討回公道的「翻案」過程。從宏觀角度看，這一結論和魏昂德(Andrew Walder)在《斷裂的造反》(*Fractured Rebellion*)中，將北京紅衛兵在文革初期的立場和態度歸結於工作組的處理方式和雙方關係的結論其實有相通之處。由此看來，文革初期基層的造反活動，很大程度上是對工作組的遺留問題的清算。

陳意新指出，在老翟村及定遠縣發生以「翻案」和「解決待遇」為目的的造反活動中，真正的動力是「個人利益」訴求和報復及宣洩的欲望。這提醒我們，文革中社會衝突的根源，在於文革前的制度文化缺乏正常途徑解決諸多隱藏的社會矛盾；而類似「派工作組」這種傳統的危機管理方式更進一步激化衝突，新的積怨藉文革這個鼓勵底層自發造反的契機釋放出來。其極端形式——武鬥——的最終結果，卻是文革初期的激進造反派在「一打三反」中被國家機器鎮壓。

作者反覆強調，農民的政治選擇基於個人利益而非意識形態，因此，他進一步否定關於存在一個反官僚的「人民文革」的假說。但是筆者以為，

作者的研究就效果而言似乎是佐證而非否定「人民文革」的存在。當然，概念的前提是不再把所謂「人民文革」上升為一個具有明確自我意識和挑戰性、和官方文革並行的運動。如果我們把「人民文革」重新定義乃至命名為作者描述的這種分散的、洩憤和復仇式的，既被私人目的和情感驅動卻又盲目從眾的「小文革」，這種與上層話語背離的「形形色色」的文革確實存在。

伍國 美國

2016.8.18

## 以「無名」之名去反抗

閱讀王愛和的〈文革中的地下藝術——無名畫會〉一文(《二十一世紀》2016年8月號)，筆者覺得「無名畫會」更新了我們對「前衛」或者「先鋒」的傳統看法。在中國，討論「前衛」或者「先鋒」藝術，大多是在西方各種現代主義藝術的理論框架中進行，我們似乎不太習慣於從本土出發討論自身的藝術情境，一方面，我們明白發生在中國半個世紀以來的各種藝術現象，無不和西方有或明或暗的關聯；另一方面，我們又愈來愈清楚地意識到，基於眾所周知的國情，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確實無法套進西方所認定的邏輯中加以描述。

「無名畫會」中有兩個時間節點是具有時代意義的。第一個節點是1968年8月18日。這個日子是毛澤東在北京接見紅衛兵的開始，標誌着紅衛兵運動的風起雲湧。也是在這一天，「無名」的幾個主要畫家在遠離政治中心的北京郊區十三

陵進行油畫寫生。正是這一事實告訴我們，隱藏在宏大敘事背後的「無名」是如何頑強地表達自己：他們的遠離本身，就已經構成了一種真實的反抗，甚至比具體的藝術寫生更有價值。第二個節點是1975年1月1日，「無名」在北京張偉家秘密舉辦了第一個屬於自己的展覽。來者都是圈內人，進門有暗號，一切都在悄無聲息中開始和結束。這就像潛藏在狂潮背後的清流，時人無法洞察其思想的脈絡，它卻一直源源不斷地流向了今天。歷史的豐富性正是在這兩個時間與歷史交錯的節點中充分彰顯了出來。

相比之下，從藝術的形式出發討論「無名畫會」的風格傾向，就顯得有點軟弱無力。甚至，筆者覺得，在中國特定的歷史情境中過度執著於形式問題，實在有點殘酷的意味。至少筆者是這樣去理解王愛和的觀點的，她既是當年「無名」的一員，同時又是一個試圖站在更為廣闊的社會立場上揭示那一段歷史的嚴峻性的重要學者，其中的意義，正是她所期盼並努力挖掘的。

最後補充一句，法國印象派和後印象派在藝術史中無疑具有革命性，但是當它們進入第三世界國家的社會運動時，卻在一開始就被定義為某種代表着西方的「反動」存在。也許，站在全球化的立場上看，這是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對「無名畫會」的認知，肯定也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密切相關。

楊小彥 溫哥華

2016.8.24